第 57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7, No.3
2020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20

游国恩先生的文学史观及其对早期文学史的建构
——兼论 20 世纪上半期文学史观的演变

钱 志 熙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游国恩在 20 世纪的文学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位置。20 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史观大体可分为传统文道派的广义文学观与辞章派的狭义文学观,以及源于新文学派的纯文学观这样三大类型。游国恩的文学史观有一个从六朝派的文学观向折中于上述各种广狭义文学观的发展过程。其间章学诚的观点对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游氏根据章氏著作、辞章两分之说来确立文学史的对象。其最早对先秦文学的叙述,仍然采取早期诸家上古三代的叙述框架。文章也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以治化与辞章来梳理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贡献做了肯定。

关键词::游国恩;文学史观;先秦文学;章学诚;林传甲
中图分类号:I 207.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3-0071-12

作为近现代与西方学术预流的文学史建构,是 20 世纪初大学文学学科确立后的一种新的学术研究与著述的形式。游先生早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本科(1920—1926),接受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学。续后任教于中学、大学,从事于文学与文学史的教学,撰写多种文学史讲义。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主持编纂《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并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文学史》(全四册)。后者迄今仍为许多高校中文系所采用的教材。在 20 世纪建构文学史的历史中,游国恩先生无疑是具有重要位置的一位。

文学史建构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时代性的一种知识表述,也可以说是最具有群体性的学术探讨。20 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史著述,不像后来一些时期那样大同、划一,可以说每一位在文学史建构方面有著述的学者,对文学史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探讨,这正是当时学术的胜景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共同的知识积累的文学史,与其他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每一个时期的文学史著述,会有大致相同的模式。

游先生的文学史建构,同样体现了群体性与个人探索结合的特点,与他接受的文学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也受到并时诸家的影响,当然也与诸家多有商榷。其中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及文学史观的汲取与改造。所以,我们研究游国恩先生的文学史建构,不仅要涉及"20 世纪文学史观演变"这样一个课题,还要涉及中国古代时期的文学观问题。

一、20 世纪上半期文学史观的确立与变化

20 世纪上半期,是现代形式的文学史撰写的确立与发展的时期。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文学史的对象、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游国恩先生在 1956 年撰写的《对于编写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谈的正是这个时期各家对文学史内容不同的处理方式:

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这是一个关于文学取材的范围问题,也是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过去有两

收稿日期:2019-09-28
作者简介:钱志熙,男,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种距离很远的看法:一种把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另一种则又缩小得异常窄狭,而多遗漏。前者如清末光绪三十年林传甲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全书十六篇,凡文字形体、古今音韵、名义训诂、九经、诸子以及二十四史都包括在内。甚至《素问》、《灵枢》、《九章算术》、作文修辞法、虚字用法等等,无所不讲。真是广大无边,包罗万象。一直到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还是把佛教、反切和经学及今古文学派都列入文学范围,一并讲述。后者如五四以来的许多文学史只讲诗、文、词曲和小说,先秦诸子、《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都不讲。其甚者如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要》就只讲诗歌、词、戏曲、小说四类,连散文和汉以后的辞赋都排斥在外,就是最突出的例子。①

这里所说的文学史范围的极为广大或缩小的问题,即他在早年撰写《先秦文学》所说的:"今综约诸家之说,不外广狭义二义。"②上文中他主要举了两种,一种是林传甲、谢无量式的广义的文学史观,另一种是五四以来只讲诗文词曲,将诸子散文、史传散文都排除在外的狭义文学史。后一种又以"纯文学"标举,他举了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为例。刘氏文学史不仅不讲诸子史传类散文,甚至连汉以后的辞赋都排除在外。将诸子及史传散文排除之外,可以理解,汉以后的辞赋为何也被排除在外呢?这是不是与他们所标举的"纯文学"宗旨冲突呢?游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讲到他对五四以后一些文学史家把六朝骈文排除在外的现象,也属于同样的现象。我们知道,无论是辞赋还六朝骈文,都是古代辞章文学的代表,在六朝派的文学史建构中,非但属于文学,而且是文学的中心。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史家,采取西方的抒情、想象、形象创造等概念,建立一种倾向于西式的文学价值观,同时又片面地理解"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发展规律,于是将汉以后的辞赋及六朝骈文都排除在外。还有像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甚至将唐之后宋元明诗全部略去。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严重地影响了辞赋及唐以后古近体诗的研究,至今仍未能完全纠正。游先生在这方面,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的。当然,这种新文学派的文学史建构,将传统文学史观所基本忽略的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上升为文学史的主流,使得中国文学史从另一方面得到更完整地呈现。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一基本的观念,同样也影响到先秦文学史的建构。所以,说到狭义文学观,其实在 20 世纪的文学建构中至少有两种类型的狭义文学观,一种源于传统辞章派、直接地说源于六朝文笔说的狭义文学观,另一种则是五四以后以"纯文学"标举的狭义文学观。后者其实是立足于文学本质论或说文学价值论的一种文学史观。当然这种文学本质论或文学价值论,主要是渊源于西方的。其基本的建构方式,即是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类型来建构文学史。至于传统的"纯文学"观,即六朝派的文学观,是立足于辞章本质与文学体裁的。游先生在上面这个谈话式的文本中没有说到这种源于辞章之义的狭义文学观。其实,游先生最早所采用的文学观,就是倾向于传统的辞章派的文学史观的。

我们现在确立这样的基本认识,即 20 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史观,从其大类来看,可分为林、谢式的无外不包的广义文学史观,源于六朝文笔之说的辞章派的文学史,与后来最具影响力的五四以后新文学派文学史家的"纯文学"的狭义文学史观。这三种大体能够概括这个时期文学史讨论与建构的基本类型。前两种,即林、谢式的广义文学史观与辞章派的狭义文学史,基本上来自传统。如果追溯其渊源,一种源于唐宋古文家的文道观,其最近的传递者则为桐城派;一种源自崇尚有韵为文的六朝文笔说;其近源为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派。这三种文学史观,都曾是游国恩的学术背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京师大学堂的讲义,桐城派的文学观更曾是京师大学堂最流行的文学观;而刘师培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古文学史讲义》正是宗奉六朝文笔说的文之义,当然也是直承阮元"文言说"。另外,新文学派诸家如周作人、钱玄同等,也多是游国恩的师承。

①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 527 页。

② 游国恩:《先秦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第 1 页。

二、游国恩的文学史观及演变

游国恩的文学史观,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民国时期的两种文学史讲义与专著来看,是有一种变化的,或者说前后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传统辞章派的文学观,即刘师培一派的狭义文学观,转向折中辨析于广狭两义之间以建立他自己的文学史观,并确立自己的文学史叙述范围。当然在这过程中,他也接受了新文学派的文体四分法及从社会发展方面寻找文学发生原理阐述方式,将“情感冲动”“生活压迫”作为文学发生的两个重要原因①。

游国恩 1929 年任教武汉大学中文系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先秦两汉部分,以及 1931 年、1932 年在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时续写的三国、两晋、刘宋文学的部分,由游宝谅先生等人整理,用《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的书名,作为“名师讲义”的一种,2005 年于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它反映了游国恩最早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建构方式。

民国时期的文学史讲学,多是从确立文学的内涵、界定文学史的范围开始的。这正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史观纷繁多元的具体表现。游国恩在早年从事中国文学史的讲述与撰著时,也是这样做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第一篇《导言》,就列“文学之界说”“文学之起源”“文学之流变”三章。前面两章,就是阐述他的文学定义与文学起源说,第三章主要讲述他在整体文学史方面的观点。

《讲义》“文学之界说”一章中,作者认为“我国学者于文学之观念向极模糊。陈义虽多,而求合于文学之根本原则者实鲜。是用众说纷呶,莫衷一是。”②这几句可以理解为作者对前此文学史著作界说文学定义的一种概括,并且提示我们,作者是在寻求“文学之根本原则”这一思考方式的启导下来思考、讨论文学的定义的。接着作者指出,由于文学界说之不明,也由于中国文学“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绝无有系统之说明。卒之杂摭经传子史阑入文疆,而于真纯文学,反屏诸竹帛之外。”③所谓真纯文学,近于“纯文学”。近代以来文学史建构,有一个基本趋向,就是从大文学(包括杂文学、实用文学)向纯文学演变。游先生所说的“杂摭经传子史阑入文疆”,就是指早期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1905—1904,据陈平原考证)这些著作的建构方式。林氏之著以“治化之文”来概括从皇古到春秋、战国秦代的文学,其范围包括经、史、子三部分。而且以此三部分为上古三代文学的主体。来氏之著的第一编与第二编,也是以上古三代的道术文章为主体。其中如“周代之学术”“老子之道”“孔子之道”等专题,其内容显然可见。虽然他们所用的“文学”“文学史”这样范畴,已经是新的文学教育体制的产物,并且吸引了西方关于文学与文学史的内涵;但在落实到中国文学的具体内容方面,他们并没有严格地按照近现代的“文学观”“文学史观”来处理,而是更多地沿用中国古代对文学与文学史的处理方式。其间的是非利钝,非简单数言可断。但他们留下了一个课题,即如何从中国古代复杂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章中,建立一个新的关于文学的判断标准,最大限度地呈现中国文学史的全体真相。另外,向来被排除在文人辞章之艺之外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性、娱乐性的文学,将如何纳入?这无疑是游先生他们这一代文学史家工作的起点。

那么游先生是怎样寻找文学定义的呢?他先从《说文》“文”为“错画”“乐竟为一章”出发,论定文章之本义。然后历引《礼记·月令》《毛诗·大序》之说,论定文学的基本定义曰:“文学之意义不外乎两端,一曰声,二曰色。色者翰藻,声者宫商。作者连属字句,组织篇章,和其声,设其色,以倾泻其思想情

---

① 游国恩:《先秦文学》,第 9 页。

②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第 3 页。

③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第 3—4 页。

感于寸楮尺素间,而文学之能事毕矣。”①从这个角度出发,游先生提出“文学为独立之艺术”的观点。这当然是一个新派的观点。但他征引的主要是六朝文论家如萧统《文选序》之“沉思翰藻”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玄黄律吕”、以及刘勰《声律》《俪辞》《情采》三篇之论,来论证上述“文学为独立之艺术”的观点。他认为上述六朝文论家之论,“可谓抉文论之精微,发艺文之奥秘。”②在这样的观点下,游先生提出了六朝文学至盛论,并对章太炎将文章扩大到包络一切文字作品的大文学观提出异议:

> 故余谓从来文人之真能识文学者,无过于六朝。而文学极盛之时代亦无过于六朝。后之人反横指为八代之衰。务为从横恣肆佶屈生涩之杂笔以相胜,抑何其愚且谬也。近人章炳麟先生复痛诋阮氏说为自陷。乃变本加厉,谓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原注:详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是又辞之蔽哉!③

从上面所述可知,游先生的文学观,远述《乐记》《大序》等的情感论,中承六朝文笔论中的“文”论,近承扬州学派阮元的“文言论”。而追寻其最近的一种渊源,当然是其就读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中的文学观点。将游先生的这个文学界说与刘师培的《文学辨体》参看,相承之迹极为明显,尤其是推重六朝而隐然贬低唐宋古文的看法。我们知道,刘师培之所以发挥六朝文论家与阮元的文笔之说,是以此前主讲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姚永概、马其昶等人的唐宋古文派的文道论为辩论对象的。而章太炎以凡著于竹帛为之文的文学观,正如作者所说,又是针对阮元、刘师培等人过于注重文学形式的观点而发的。但矫枉过正,将文学界说的定义退回到林、来等人之前,而且也与中国古代文论家的观点大相径庭。所以游国恩先生在这里斥其为“辞之蔽”。

在 1934 年出版的《先秦文学》中,游先生对其文学史观做了较大的调整。全书共分十八篇,开端部分的“一、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二、文学导源之两大要素”这两篇,其内容与武大讲义基本上是相承的,但作为正式的著述,内容更为丰富,论述更具系统。其中最重要变化在于,游先生已经放弃简单地采择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强调从广狭两义之间取得一种合理的折中。

《先秦文学》开宗明义即提出历来论文学,存在广狭二义,并且是从追溯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出发的:

> 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彷徨歧路,盲目操觚,汇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今综约诸家之说,不外广狭二义。④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史建构的各自依据与分歧,一些学者比较简单地局限于近现代学术进程中讨论问题,好像只是现代学术中才发生的问题。其实分歧的根源,是埋藏在整个古代时期对于文学的种种不同看法,即游先生所说的“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我们权且做这样一种比较简单的叙述:中国文学源于上古,自文字发明,著述初形,战国以后辞赋、篇章之义立。魏晋六朝以降,文人诗赋发达,骈文产生,就有一种文笔之说,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萧统《文选》正是六朝人较狭窄的“文”的名义上来选择作品,排除经史诸子。这与其时齐梁文学的修辞至上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的确具有“文学自觉”的意味,并且是第一次明确地论定的“文”的范围。所以初期建构文学史诸家,无论赞成与否,无不征引六朝文笔之说。唐代文学是从反思六朝文弊的前提下发展的,唐代无论是诗,抑或文,赋,都有复古之义,诗重言志,文以载道。诗宗六义,文推六艺。都是以圣贤之著作为典范。其实这种倾向,在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中已经明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对文学的理

---

①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第 4 页。
②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第 5 页。
③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第 5 页。
④ 游国恩:《先秦文学》,第 1 页。

解,就存在上述六朝派与唐宋派的分歧。这个问题,在晚清的一段时间,又演为桐城的古文与扬州派骈文之争,其争议都不止于文,同时延伸到诗歌方面。到了现代,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并且用一种新的文学界说来重新董理中国古代各种分歧的文学观。各派文学史观的分歧,即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原有分歧,再加新的西方文学观的引进而造成。游先生正是在这些分歧中建构他自己的文学史观的。

《先秦文学》从广狭二义来辨析前此的文学观。对于广义的文学观,游先生举了章太炎的观点,狭义则举了阮元的观点。与《讲义》之专宗六朝及阮元之论,斥章太炎之论为“蔽”不同。《先秦文学史》对上述广狭两说的是非利弊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说各有其合理性,也都有他们的偏弊。

章氏之论,“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其意在于要推广文学之源,从文字产生中寻找文学产生的原理。但是却造成了文学特征的消失与界限的模糊。游先生对章氏之论做了这样的评述:

> 章君论文,盖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以为文字者本以代言,各当其用,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故又曰:‘以是为主,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文气、文德皆为末务。’夫沿波讨源,其论诚为有见,然枝派既分,自不可一概而论。盖今之所谓文辞文章者,正以其有文有章也。夫曰文,则辞采斐然尚矣。曰章,则节奏低昂尚矣。如此,则表谱簿录之无句读者,例不得与。故今日论文,而欲尽撤辞华声音之藩,艺文学术,一切并包,则茫无畔岸,将使学者望洋兴叹,无所适从矣。此蔽于实之过也。①

他指出章太炎之所以从文字的运用来论文,是沿波讨源,从文字的发生寻找文学发生的原理。中国文学的主体,是文人书面的辞章文学,所以古代讲文学起源,不从语言的产生来讲,而是从文字即书写的发生来讲。游先生认为章氏这样论文学,是为了重其根本,即文学的根本在于“代言”,即表达人们的思想与愿望之类。章氏认为文笔派仅讲文辞,唐宋派讲兴会神旨,都非文学的根本。所以,章氏的文学观,同时也是他的一种文学价值观。游先生肯定了章氏的这种用意,也承认他是探本之论。但文学的发展,毕竟在于纯文学的审美价值的确立,即“辞采斐然”“节奏低昂”之类的审美特征。如从源头论,章氏将无句读不成文辞者列入文学范围,自有其道理;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则章氏想要撤掉辞华声音之藩,将一切文字作品都包括在文学范围之中,将使论文学、治文学史者无从措手,当然也会影响文学创作中作者对文学艺术性的把握与实现。游先生以“此蔽过于实”来评判此论。意味着他并不依章氏这一类广义文学论来界定文学范围、确定文学史的研究对象。

依章太炎的观点,凡是使用了文字的,都是“文”。其中又有不成句读,即不成文辞的,如表谱、簿录等;章氏认为它们虽然不能称“文辞”,但却不能不称为“文”。有成句读的,即我们所说的文章的,章氏称之为“文辞”。其中又有有韵与无韵之文的区别。章氏将“文”推到包罗一切文字作品的边界。其实他本来就不在论文学,而是在论文学由之产生及寄存的整个文字活动。按章氏之说,其实不无汲取其同乡章学诚以著作、辞章论文学的观点,但有很大的变化。

游先生所举的狭义的文学观是阮元这一派。阮氏著《文笔对》《文言说》等文,畅述六朝骈体为文学正宗之说。他以《文选序》为依据,强调认为《文选》的“文”,即是昭明所划定的“文学”的范围,必要错比文华、综辑词采,沉思翰藻,始可称文。不具备这种“文”的特征如经、子、史,以及清言质说的文字,都不能归于文学的范围。当然,阮元的具体论述方法,与《文选序》有所不同,他准六朝以有韵、偶对、修饰为文之义,进一步地认为,孔子所做的《易·文言》是一种韵文之体,用韵俳偶。而此文正是以“文言”为题。于是,他认为:“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②

---

① 游国恩:《先秦文学》,第 2—3 页。

② 阮元:《揅经室集·揅经室三集》下册,卷二,北京:中国书局 1993 年版,第 606、605 页。

游先生在《讲义》中曾全部接受以上六朝派及扬州派的文论,但在著作《先秦文学》时,对这种传统的狭义文学观进行了扬弃。他认为阮氏专信昭明之论,昭明以经、史、子为非文。但是曹丕的论文既包括奏议书论,刘勰《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所包犹广。这其中,即有实际上属于经、史、子的性质的文体与文章。而《文选》本书之内,也有性质实际上属于子史的文体与文章。所以昭明所标"文"的定义,与其本书也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因此,未可以《文选序》《金楼子》立言篇等家所论文之说为定论。但游先生对六朝文论家对文学独特的审美形式的揭示,还是给予相当的肯定的,并且认为六朝文学家抓住了文艺的本质,是一种进步。"齐梁诸人以艺事衡文,盖亦恶夫冲淡之辞,醉心华饰之语耳,本未可以厚非也。独因此而遂悍然摈诸文字之稍质朴者于文学之外,则亦昧于古今学术源流之过也。"①

在辨析传统的广狭两义之后,游先生依据清人章学诚之论,推出他自己的文学观:

> 章学诚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沮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其源而势不容不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承其流而代变其制焉。"②

章氏此论,虽然是本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概念,但以著作与辞章两个范畴相对,剖开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体的文人辞章文学的源与流。章氏是从著述,即书面写作的立场来谈文学的,这比章太炎从文字来谈文学,更加贴切。章氏以著作为专家之学,其义重在立言,此实即指春秋诸子百家之学。战国秦汉之际,专家之学衰,而文人辞章之艺开始兴起,直接导致了两汉以辞赋为主体的篇章文体的兴起。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但篇章文体中,仍有传记、经义、论辨诸体,其实正是接着经、史、子的专家之学的。它们是以辞章之艺饰于实用之文。上述游先生认为昭明所选篇章之中有实际上属于经史子性质的文体与文章,即是用了章氏的这种别择方法。这些文章,都是兼重立言与辞章之义的。舍此诸体之外,专重辞章者,即我们所说各种纯文学的文体,如诗赋之类。然而诗赋也不是不取义的,诗言志,赋取古诗之义。这一点章氏没有强调,所以在价值的判断上,仍然表现出重经史子而轻文集的倾向。这是古代儒家一派的基本倾向,并非章氏一家独有。章氏的贡献,正在揭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这个基本的事实,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树立一重要的纲领。游先生的文学史建构既深受此义启发。

游国恩先生从辨析文学的广、狭两义的所得与所失出发,最后由上述章学诚的观点出发,做出他自己对文学范围的界说,同时也对先秦的文学史的对象做了最初的犁定:

> 然则文学之范围宜如何?曰:学术之不能不分而为辞章者,势也;辞章之不能与经传子史完全绝缘者,亦理也。知后世经义之文之出于经学,则不能排"六艺",知传记之出于史学,则不能排《左》《国》;知论辨之出诸子,则不能排《庄》《列》。先秦文学,即在专门著述之中,固未可以决然舍去也。抑余有说焉:西汉以降,文章渐富,著作始衰;迄于萧梁,文集著录,已成定例。故由今日论之,文学者,以孽子而亢宗,著作者,虽不祧而自替者也,由斯而谈,先秦之文若《六艺》,其中如诗固无论矣。其《易》《礼》《春秋》未可以文论也。《书》以道事,虽不以文为本,要为记言之文所自出,自当在叙述之范围。《左传》《国语》《国策》虽属史家之言,而实兼文词之美,尤不可以勿道。(《公羊》《谷梁》二传专主释经,且汉世始著竹帛,亦不能以先秦之文论)其诸子,若墨翟之书,文辞朴拙;名家之言,专在辨析(其伪书自不必论);杂家之文若《吕览》,虽间有可取,俱可从略。(兵家方技准此)惟道家则庄周绝胜(其伪书今亦不论);儒家则孟荀杰出,法家则韩非为尤,与夫小说家之《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并从《四库》著录)皆宜泯其畛域,列入文疆。盖于较大范围之中,仍寓以文辞为主之意,(《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书虽不能以文辞论,实

---

① 游国恩:《先秦文学史》,第 5 页。

② 游国恩:《先秦文学史》,第 5 页。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61 页。

为后世小说之祖也)非苟为调和之论也。总之,先秦之文,类属专门之书,兼采则势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碍。大抵其情思富有,词旨抑扬,及与后世之文有密切关系者述之,则斤斤微尚之所存也。①

这里用来辨别文学内涵的关键概念还是辞章艺术,即游先生自己概括的具有"情思富有,词旨抑扬"特点的作品。这是源于六朝派而经扬州派及二十世纪初文学史家刘师培等人发挥、完善的一种纯文学观,同时也汇入二十世纪新兴的抒情、想象之论,它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文学的基本性质。但是正如唐宋带有复古色彩的文学家将自身的文学传统推源于经史诸子,上述六朝纯文学观的局限,在于只揭示出文人文学的流,而没有追溯到它的源;并且它将文学的功能完全理解为一种辞章艺术,也是不全面的。唐宋诸家的文道观、根本枝叶之说,正是以六朝"修辞主义"(使用青木正儿《支那文学思想史》的说法)为纠正的对象②。从这里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文学观方面的自觉的,并且有一个从六朝文学观到唐宋文学观的发展过程。扬州派阮元等人,重理六朝派文学观,用来对立同时属于唐宋派的桐城派的文学观。可见,这一中国古代文学观的发展过程,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大学文学史教材编纂过程中,又浓缩式地演变了一番。当然,这是在二十世纪引进西方文学史的著作模式的情况下进行的。所谓狭义文学(或纯文学)、广义文学(或杂文学)的概念,就是一种新的概念。但是在把握、分析它们的实质的过程中,文学史家主要使用上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学资源的。章学诚可以说是勾通六朝派与唐宋派的重要学者,而游国恩先生正是在章氏之说的基础上犁定先秦文学的范围。这样,既克服唐宋文学观的混沌,又超越六朝文学观的偏狭。但是也带来新的问题,当我们以根源辞章艺术的标准来取舍先秦的经、史、子著作时,是否又将先秦的文学割裂了,并且所谓"情思富有,词旨抑扬",说到底是属于审美的判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把握形式。那么,先秦文学的界域,是否永远只能处于不能确定、主观选择的状态?这恐怕正是今天我们建构先秦文学史时所面对的问题。看来,20 世纪上半期文学史家从最早的广泛无边的文学史观中脱离出来,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是一个复杂、矛盾的过程。而对前者简单的否弃,也给他们自己带来新的问题。

三、从章学诚的文学史观到游国恩的文学史观

从上节论述可知,游先生论证文学及早期文学史的范围时,接受了章学诚的观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汲取了班固、刘勰等人观点,将传统的"诗教"一词创造性地发展为一个文学史的核心范畴,敏锐地发现战国文体与文学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诗教"的成果。也就是说,"诗教"是后世辞章的源头,是文人文学的发生的最重要的机制。

章学诚把文的发展历史,分为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后世之文三段。"后世之文"出于"战国之文":"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③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的"文体备"的文体,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章体裁,而是指文章之体,亦即辞章之体。但他与《昭明文选》离经史子而专揭"辞章"之义不同,他的辞章之义、文章之体,都是源于"六艺之文"。这原是自刘勰以来持儒家文艺观者的主流看法,但章氏在六朝派、扬州派等专以辞章为文之后,重新推溯文学的渊源在于六艺及子史百家,并且形成明确的史观。在章氏看来,六艺之文,是文与道合,然文艺未明,文体未备。战国之文"裂于道",而文体备,辞章之体确立。后世之文始于战国之文,而战国之文源于六艺之文。其间的不同,不是根本性质的不同,而是道与文的比重之不同,或者说立言与修辞的比重的不同。六艺之文即六经,战国之文即诸子百家,也包括策士之论,辞家之赋等。六艺文主要是体现道,但文也在其中;战国文与后世文主要体现文,但也未完全离开道。于是章氏提出他的"建构"文学史的方法:

---

① 游国恩:《先秦文学史》,第 6—7 页。

② 青木正儿:《支那文学史》,东京:岩波书店 1943 年(昭和十八年)版,第 71 页。

③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 60 页。

> 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以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①

这与唐宋派的完全以道衡文,认为文就是道的体现,文以载道不同;也与六朝派的完全离道而言文,认为辞章之文与经史百家之文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物不同。这样就打通了经史百家之文与辞章众艺之文的疆界,也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事实。

严格地说,章学诚整个文学观的建构,其原本的动机,或说指向,并非是要建构一个纯粹的文学史,而是要评衡历代文章的高低,考镜出从六艺之文到战国之文,再到后世之文的源流演变。他用来辨章这个文学史源流的基本概念,还是“道”与“文”。当然他将这两个概念进一步延伸,提出“著作”与“辞章”两个概念与之对应。而他这里的道,不仅是“道”之道,同时也是文之道。文之道,即是文学发生的原理与发展的规律。

关于章学诚的文学史观,我曾写过《论章学诚在文学史学上的贡献》②一文加以阐述。章氏文学史的建构,与其整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体系一样,意义极为丰富深蕴。有一种观点,认为章氏的文学观,是一种广义的文学观。我在写那篇文章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曾从广义文学观的角度来阐述章氏的文学史观。这次通过对游国恩先生文学史观的学习,我发现这种定位其实仍是皮相之论。从中国古代文学观的发展来看,六朝的文笔说与唐宋的文道观是明显的两端。章学诚的文学观,表面上看来是从文道观的思路出发的,因此有学者仍在文道观的范畴中阐述章氏文学思想。但事实上,章氏是探索到这两种文学观之前汉儒的司马迁、班固的文学观,当然也充分地吸取刘勰的文学观,然后通过他自己的研究,建构出一种超越上述六朝与唐宋的两种文学观的他自己的一种文学史的建构。20 世纪上半期文学史建构的发展过程,其实正是浓缩了章氏上述文学史建构的过程。

如果认为文笔说是狭义文学观的代表,而文道观是广义文学观的代表,而理解章学诚以及游国恩后来的观点,只是对广狭两义的折中。这从表面上看似乎也对。但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实质在于其中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别。即广狭两种文学观,都是就事论事,或从形式、或从内容的一端来把握文学,其基本的把握对象是文体与文类,而章学诚则是从文学的本质出发来把握其对象的。是一种本质论。我前面的那篇文章,其实提到这种看法,但没有看到它与广狭两种文学观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章学诚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阐述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对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史建构有很大的影响。较早叙述的文学史的林传甲、来裕恂两家,都受到章氏观点的影响。林氏所受影响尤大。林传甲是现代撰述体系“中国文学史”的初创者,他自述是遵大学堂章程中“日本有文学史,可仿其意”的规定,“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以成书”,但其核心的建构方式,其实是来自章学诚的思想。林氏文学史,向来被讥为庞杂,其实有他自己的一种内在逻辑。与后来的文学史只叙述已成的文学事实不同,林氏其实是将文学作品凭借生成的媒介,或者说载体也包括在里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心是文人的文学,是一种辞章的艺术。所以,林氏之作前面三篇分别叙述文字、音韵、训诂。从上古到周代,文学的发展,有一个从口头到书面的过程。书面文学或称书写文学的发生,当然始于文字的发明。章太炎有“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的看法,即是章学诚辞章源于著述的意思。林氏在讲述文学史事实之前,讲述作为文学事实造成的媒介的文字、音韵、训诂。后来日本青木正儿《支那文学概说》“第一章语学大要”,列“六书”“训诂”“音韵”三节,正是吸收林传甲的体例。③ 林氏真正叙述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事实的是其第四篇《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这一篇实际上是勾通古今文论的,其立论的要点在于刘勰开创的文变染乎世情之说,并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 60 页。

② 《文学遗产》2011 年第 1 期。

③ 青木正儿:《支那文学概说》,东京:弘文书局 1935 年(昭和十年)版。

且深受中国古人三代治世之说的影响,其意又合乎刘氏“宗圣”“征经”之义。至于其将文学的功能分为治化与辞章两项,并且认为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辞章为文,文学的升降的要点在治化与辞章比重的改变。这样的观点,与章学诚以著作与辞章作为标准将文学分为“六经之文”“战国之文”“后世之文”的观点是相通的。而且明显地受到章氏的启发。其叙述皇古、虞唐、夏后、殷商、豳岐、文武、阙里、邹孟、荀子、秦始皇为治化之文,而以汉代为治化与词章两分,其后叙“六朝治章之滥”“唐人词章为治化”“宋元治化之广狭词章之工拙”“明人之治化词章误于括帖”。观其此章之意,用后人的标准来说,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变迁史。当然这里是有林氏个人的一种建构,也有浓重的传统文学观的影响。但正是其为后来的文学史所不及的地方的。接下来的第五篇《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篇《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则是辞章艺术的原则,作者的辞章观仍然是传统的“征圣”“宗经”的观点的,但也大量参照了后世文章学的观点。接下来第七篇《群经文体》、第八篇《周秦传统杂史文体》、第九篇《周秦诸子文体》、第十篇《史汉三国四史文体》、第十一篇诸史文体。是讲经文、史文、诸子文的源流。这一篇是其与后来文学史差别最大的地方,但是从群经到史汉的文章,其实又被后来者所局部采取。其开拓之功,也是未可忽视的。以上七、八、九、十、十一所叙各篇,实是对“治化之文”发展历史的具体的展开。这一部分,相当于章学诚所说的“六经之文”“战国之文”。此下第十二篇《汉魏文体》,第十三篇《南北朝至隋文体》,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则是具体地展示汉以后辞章之文的演变历史。值得强调的是,林氏所说“文体”,与章学诚所说的“至战国而文章之体备”的“文章之体”意义是相近的。最后第十五篇《骈散古合今分》、第十六篇《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是专重辞章之体的典型代表骈文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把握中国古代辞章文体的关键词“骈”与“散”①。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林氏《中国文学史》的核心概念是“辞章”。但他的辞章,是桐城派的“辞章”,所以兼重治化,或者说是以辞章与治化的平衡为文学的要义,而非六朝派和扬州派的文笔之说中的“辞章”。其梳理治化与辞章的升降,则是取了章学诚的基本判断而加以发展。

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在关于战国诸子之文的论述中,其实也深受章氏“至战国而文章之体备”的影响。他分诸子文学为春秋与战国两期:

> 第二期为战国之际。此时期全为诸子流派所组织。齐鲁之乡多儒家,荆楚之地多道家。当是时,儒家有孟子、荀卿,一言仁义,一言礼乐,以大发儒家之精华。道家则有庄周、列子,洸洋恣肆,驰骋己意,阐明虚无幽元之旨,其他有名法杨墨等,然当时之学说文辞,记载于文学史上而有价值者,又岂独九流百家为然哉。盖此时之文学,杂驳烂熳,已达极点矣!②

来氏虽然没有明言引用章学诚的观点,但是从他提出的“学说”“文辞”这两个关键的概念来看,正是受到章氏著作、文辞之说的影响。而其断言战国时期的文学,“杂博烂熳已达极点”的观点,正是章氏所说的“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至战国而文章之一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这样观点的影响。只是来氏对章氏之论,引而未发。不像林氏,将章氏之说发展为整个文学史的纲领。

其实章学诚之说的要义,在于抓住中国古代文人文学及辞章艺术的主体。所以,超越了文体与文类。其实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本质论。抓住了这个本质,不仅可以驰骋各种狭义的文学文体、文类之中,而且可以打通文、史、哲。所以,这种文学史观,是超越了近代以来流行的广、狭两义的文学观。又因为它要寻找的是文学本质,所以也是一种文学价值判断的文学史建构。

章氏的观点,对于游先生建构从先秦到两汉这段文学史尤其具有启发性,此后游先生建构文学史,就是摆脱广狭两种观点,寻找以辞章(包括情感与想象)为核心的文学史的对象与范围的。另外,像章学诚的战国文体说,对游先生也有启发。在 1956 年撰写的《对于编纂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中,游先生将

---

① 以上引述见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目录,第 1、32、42、53、63、150、161 页。

② 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长沙: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30 页。

中国古典文学史分为六个时期,其中“第一期上古到春秋末”“第二期战国到东汉”。其以“战国”为第二期的开端,其中当然接受了章氏的观点。从今天的观察来看,从战国到东汉,正是篇章文的发生与发达的时期,其中核心的文体就是辞赋。接着的第三期“建安到盛唐”,原是闻一多等人的一种观点,其核心之义,当然是诗成为主要文体,从建安到盛唐完成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过程即从文人诗初期经典“建安”到高峰期的经典“盛唐”。

四、游国恩先生对早期文学史的建构

早期文学史的著述,基本上是按照上古三代的序列来叙述的。这其实是二十世纪初期文学史的通例,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黄人、林传甲、来裕恂这三家的文学史,尽管具体的章节安排差别极大,但是都是按照上古三代的基本脉络来叙述的。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早期的一些史著也有类似的情况,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甚至对传说中的伏羲、神农、苍颉、力牧、风后一一叙述,而继以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这完全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史观在 20 世纪初文学史、哲学史教学中敷演。

最能代表游先生早年文学史建构的《先秦文学》一书,其中对上古三代文学史的叙述,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等人的文学史仍有脉承的关系。《先秦文学》相关列篇之目:《未有文学时之初民文学》《种族战胜与文学之开幕》(笔者注:黄帝)《唐虞时代之文学》《夏禹之功烈及夏代文学》《商之文明渐进及其文学》《周初文治之宏模及其文学》。① 两相比较,相沿之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当然在名义、表述以及具体的建构内容方面,是有很大的发展的。而做出发展的重要的概念,在于依据西方文学的文类,尤其是依照歌谣、神话传说、散文、小说等概念,来建构上古三代的文学史。

后来六十年代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基本上是依照神话、歌谣、散文、小说来叙述的。只是传世的大宗的上古歌谣,因为其文字令人生疑,无法建构,实际上已经削去。神话虽然也都是后来的传述,但认为其发生在于上古,所以可以作为上古文学的史料来处理。所以后来的文学史都从神话开始。这是后来的文学史,与前期文学史的不同。当然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游国恩《先秦文学》到后来六十年几种集体编著的文学史,最大的改变就是抛弃了上古、三代的叙述结构。这里当然有新观念的影响,也有疑古学术的强烈的冲击。以 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游国恩等五位先生主编的部编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一编:《上古至战国的文学》为例,其叙述的次第为:第一章,上古文学,第一节,文学艺术的起源;第二节,古代神话。接下来各章,分别为“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这种先秦文学史的叙述体例,是我们所熟悉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上半期各种文学史的一种集成,或说折中。但拿它来与游先生早年的两种文学史相比,差异是十分大的。

游先生的文学史与他所说的五四以后纯文学一派的文学史最大不同,应该是他对传统文学史观的比较多的传述与继承。其用以评衡的核心的标准,仍是辞章,即其所说的“大抵情思富有,词旨抑扬,及与后世之文有密切关系者述之,则斤斤微尚之所存也。”在后来撰写的《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中,游先生曾对被一些主张纯文学的文学史家排除在文学史叙述范围之外的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及后来骈文应该进入文学史的范围,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实核心判断标准,仍是在辞章艺术方面:

> 一般说来,先秦诸子的著作,都是有关哲学、政治的理论文,应该归入哲学范围。但是那些理论文,特别是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诸家的散文都是各有其特点的。他们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干巴巴的只是概念式的推理或说教的哲学论文和政治论文,而是极为生动、富有形象性的优秀的散文。它们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方法,同时也有恰当的表现形式:一般都是条理清楚,结构紧严,语言明白流畅,通俗朴素,说服力很强,特别是运用寓言故事和譬喻等表现方法,生动具体,形象鲜明,读者不觉得枯燥无味,不但不觉得抽象化、概念

① 游国恩:《先秦文学史》,第 1—2 页。

化,反而有极大的吸引力,使有感到愉快,感到一种“怡然理顺,涣然冰释”的愉快。①

对于历史散文的文学性,他也作出类似的分析,认为“它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记录,而且是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的作者不但记载事实,还要描写事实,在我国历史上开始出现给历史叙述涂上浓厚的文学的色彩。它往往把历史的记载变成极为生动的故事,甚至其中人物的形象也是描绘得非常生动。”②这里虽然加了文学性、艺术性及故事效果、人物形象等西方文学的新范畴,但这一切的核心在于辞章艺术。换言之,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其之所以成为文学史的对象,也同时是后来文人篇章文学的渊源,关键的要素就在其中有比较自觉的辞章艺术的追求。章学诚所说的“至战国而文章之体备”,说的就是诸子百家文章中已具文学的要素,并因此而成为“后世之文”的开启。游国恩先生对先秦的诸子、史传之文的确定,其范围较章氏六经之文、战国之文,以及林传甲氏的上古三代“治化之文”的概念,其建构方式有所不同,范围恐怕也有所缩小。但这是朝着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建构的主流方向走的。

至于在讨论骈文必须成为文学史的内容,更体现源于辞章文学的史家与源于新文学的史家对文学性的不同的判断方式。骈文以及与骈文类似的文体如律赋、八股之类,之所以在有些文学史中被忽略,甚至完全被逐出文学史的范围,根本的原因正在传统的辞章核心的文学史观被抒情或写实,形象或情节等现代的文学观所取代的结果。游先生针对五四以来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把骈文根本地从文学史上抹掉,以致造成六朝文学史的一大段空白这一现象,对骈文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的位置做了这样的阐述:

> 由于我国文字的特点,使我国的文学形式便于走向整齐和对偶的道路。所以骈文的形成,中国文字本身的条件是它的决定因素。刘彦和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他只觉得我们的文章很容易“自然成对”,不知道这种现象原来是由我们的语言文字的特点所规定的。骈文这种体裁萌芽很早,从东汉起,逐渐形成;齐梁以来,发展达到了最高峰。整齐的对仗之外,更讲求词藻、声律。所谓“五色相宣,八音协畅”,“宫羽相变,低昂互节”,不仅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形式,而且成为我国独有的、具有特殊风格的一种文学体裁,到了唐代,更进一步发展为对偶工整,声调更和谐的“四六文”。骈体文的发展规律同律诗一样,它们在文学史始终是并驾齐驱、双轨平行地向前迈进,追求形式,追求对仗工整,声调和谐。③

这里基本的观点,当然与六朝文笔说及阮元文言说是一样的,当然游先生超越了他们以有韵等特点为文的狭隘的文学观。

值得注意的是,游先生在将诸子、史传散文等对象纳入文学史范围中时,并不是将其全部纳入,而是有所采择的。其范围实际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六经之文”“战国之文”,但有所缩小。尤其是章氏看作文章之源的“六经之文”,游先生的建构中有所忽略,当然除《诗经》之外。《先秦文学》曾尝试对《礼》《易》的文学性进行论述,将其部分纳入文学史中。但后来六十年代编著的文学史。《诗经》自然是重心,《尚书》也被纳入历史散文这样的范畴中,但《礼》和《易》就完全被排除在外。这恐怕也包括游先生本人在内,从 20 世纪前半期到后半期文学史建构上的一个很大变化。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迄今,中国文学史的建构与著述,又进了新的一期,不仅有多种《中国文学史》的问世,而且以文学史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学”的相关著述,也有多种问世。近期,像《剑桥中国文学史》等由欧美学术界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也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可以说,学术界的同仁,从各自的角度,以各种形式,趋向文学史及文学史学这个共同的领域,而文学史全史及各种断代史、文体史乃至主题

---

①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 527—528 页。
②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 528 页。
③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 529 页。

史、接受史、影响史的建构,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这其中全史的重新建构,尤其处于核心的地位。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们重新学习游国恩先生一系列的文学史著作,探讨他在建构与著述文学史方面的成就,不仅为了纪念游先生,更是为我们今后的文学史建构与著述积累知识,提供经验。

On You Guo'en's View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His Construction of Earl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Qian Zhix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You Guo'en (游国恩)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e view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ould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broad-sense literary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Writing-Doctrine School (文道派), the narrow-sense literary view of the Writing-Rhetoric School (辞章派), and the pure literary view derived from the New-Literature School (新文学派). You Guo'en's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went through a developmental process from the literary view of the Six-Period School (六朝派) to a compromising literary view of the above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 Meanwhile, he was substantially influenced by Zhang Xuecheng's (章学诚) view. On the basis of Zhang Xuecheng's works and views of writing and rhetoric, You Guo'en determined the objects of his literary history. In his earlier narr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he still adopted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the early schools of thought from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上古三代). Lin Chuanjia's (林传甲)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中国文学史》) straightened ou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ance and rhetoric, whose academic contribution is appreciat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You Guo'en (游国恩), view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pre-Qin literature, Zhang Xuecheng (章学诚), Lin Chuanjia (林传甲)

(责任编辑　郑　园)